

对外汉语教学的

文化透视

欧阳楨人



漢

# 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透视

欧阳楨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透视/欧阳楨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301-15732-9

I. 对… II. 欧… III. 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H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7082号

书 名: 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透视

著作责任者: 欧阳楨人 著

责任编辑: 焦 晗 李 凌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732-9/H·230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2印张 179千字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序 言

我怀着欣喜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透视》一书，阅读此书使得我这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二十多年的教师有一种清新的感觉。本书的作者欧阳祯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正规大学生，长期置身于对外汉语教学第一线。他突破对外汉语教学惯常以语言研究为主要切入点的作法，以文化透视作为研究视角，全面观察和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但与传统的对外汉语文化研究又有很大的不同，本书不拘泥于文化本身，而是扩大视野，从大文化的角度透视对外汉语教学，给读者很多新鲜的视野和思考。概括起来，我感到本书有如下特点：

首先，是本书始终站在教学实践的立场上来讨论对外汉语教学的问题。一方面该书注意强调中国文化方正安稳、中庸和谐的文化内核，法天则地的宇宙精神以及顿悟、整合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又以汉语教学的实际为中心，强调课堂教学的生动性、趣味性与直观性。例如，在《针对零起点留学生的汉字教学》一节中，作者以在课堂上或者休息时间教同学们打太极拳的方式来提高同学们的“字感”，通过对中国文化精神透彻的了解和学生母语的精通，来培养学生的“情商”，增加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和动力。在《板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一节中，作者写道：“具有印欧文化背景的学生，对汉字、汉语没有认知基础，关键是要培养起他们的兴趣，要培养他们对汉字的热情，任课教师一定要使出全身的解数，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笔者的绝招就是真心实意的呵护他们的情感，关心他们的生活，体贴他们的困难，让他们真正地信任你，尊重你，然后严格要求，令行禁止，工作兢兢业业，要求一律平等，他们就会又爱你又怕你，既喜欢你又尊重你。只要善于把握其中微妙的尺度，他们认真学习的精神和干劲都会被及时地调动起来。只要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是严谨的，暂时的一点点错误都会逐步改正，阅读与书写的的能力必然会得到提高。”没



立起我们民族的语法体系,另一方面又要从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在形式与意义、动态与静态、本体与功能、个性与共性、微观与宏观、历时与共时、共同语与方言等多种辩证的互动研究之中去探索汉语语法的复杂性和人性内涵,因此贴近生活,面向千变万化的社会实际,才是汉语研究的最终出路。”文化研究与语言教学始终没有脱节,文化的研究始终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服务。这是一个可贵的立场,可贵就可贵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在作者的眼中是十分明确的,有了这种定位,才能够始终坚持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正确研究方向,能够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中明确的目标。

第四,作者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上,对汉语教师的标准进行了新的界定。作者认为:“中国最传统、最核心的价值观,也就是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应该矢志不渝、长期坚持不懈的准则、原则和标准。这就是孟子根据孔子的思想提出来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整套知识结构的哲学底蕴,也是我们对外汉语教师应该随时随地努力尊奉的为人原则。在对外汉语教学界,这种传统的价值观,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人真正提倡和鼓吹的。但是,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界与研究界的一个重大缺失。”立足于孔子“仁”的思想,从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养性的角度来讨论每一位教师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敬业精神;从“义”的角度来讨论对外汉语教学应该专注于中国的语言文化与外国的语言文化之间的相同,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作者指出:“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地想把汉语推广出去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努力寻找相近、相同的东西,这是我们汉语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种重要的心理基础。”作者的这个思想,既具有中国文化的立场,又具有世界文化的胸怀,值得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研究者认真思考。

总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正规大学生,作者在中国语言学方面受过严格系统的基础训练,具有扎实的功底。在长时间担任针对留学生的文化课教学任务过程中,作者对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和哲学史,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作者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博士论文曾经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在汉语大步走向世界的今天,作者又站在新的视角透视和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取得了与长期进行

纯语言教学研究所不同的研究成果。相信这一成果对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也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会成为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诸多学术成果中一株散发着自己独特芳香的花朵。

作者要我为此书写些什么,以上是我读书后的感想,是为序。

李晓琪

2009年元旦

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寓所

# 目 录

## 第一章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 / 1

- 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学与历史文化语义学 / 1
- 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教学 / 13
- 第三节 对外中国文化教学的一个重要途径 / 19
- 第四节 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 / 24
- 第五节 为“孔子学院”正名 / 30

## 第二章 对外汉语教学重在课堂实践 / 33

- 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学应该储备的知识、推进的流程与遵守的原则 / 33
- 第二节 板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 / 45
- 第三节 学唱民歌与学习汉语 / 55
- 第四节 以“课间短剧”带动口语教学 / 64
- 第五节 口语课中的“辩论活动”研究 / 71
- 第六节 提高高级汉语听力课教学效果的两个途径 / 76
- 第七节 浅谈零起点印度留学生的汉语教学 / 86

## 第三章 教师的人格、知识与素养 / 92

- 第一节 先做人,再做事 / 92
- 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师的精神气质 / 100
- 第三节 对外汉语教师的质量评估标准 / 107
- 第四节 新加坡本科班的培养理念 / 115
- 第五节 当代中国教育中的几个问题 / 124

**第四章 汉字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 130**

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的重要性 / 130

第二节 针对零起点留学生的汉字教学 / 135

第三节 在汉字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 / 140

第四节 关于“汉字文化”课课程设计的思考 / 147

第五节 汉字教学中的文化说服 / 154

**第五章 教材的编写与研究 / 159**

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如何面对新的世纪 / 159

第二节 规划教材《中国传统文化》编写思想检视 / 163

第三节 编写《中国文学史教程》的指导思想 / 170

**附录 作者参加的对外汉语教学学术活动一览表 / 181**

# 第一章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

## 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学与历史文化语义学

汉语本体的研究势必决定汉语教学的方向。中国内地近现代以来的汉语本体研究的西化方向也就必然地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的西化方向。我们每一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无不希望把汉语推向世界,让更多的人掌握汉语,热爱中国文化,但是,在深究西方语言学的实质,进而深究中国研究汉语的专家们削足适履的研究倾向对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的危害之后,我们大家也许会倒吸一口凉气,事与愿违,令人始料不及——

### 一

在西方,语言学从来就是与哲学联系最紧密的学科之一。从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人们始终信奉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逻各斯(logos)。赫拉克利特说:“不要听从我,而要听从语词——逻各斯,并且承认一切是一。”<sup>①</sup>在古希腊文中,“逻各斯”这个词本身兼有“理性”(ratio)与“言语”(oratio)两重含义,所以,逻各斯与言语具有天然的联系。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说:智者派的知识理论全部派生于赫拉克利特,于是逻各斯演化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sup>②</sup>在西方神学统治的中世纪,逻各斯表现为“上帝的话语”,在近代哲学史上,它又以“人类理性”的面貌牢牢地控制着思想的主流走向。因此,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逻各斯主义实际上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它夸大了人类改造世界的的能力,割裂了人与

---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2—23页。

② 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64页。

自然的关系,把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是与此完全相反的,它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情的宇宙观,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生命哲学,也强调法天则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伦理精神。

逻各斯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语音才能直接表达意义,因为只有语音直接来自人的主体与神性,是通过亚当而来的上帝的声音。于是,逻各斯主义也就成了语音中心主义。它强调思考与声音的统一,进而强调主体性与言语、言谈的统一。因此,语音在语言中占有绝对优势。作为神的真理之声,融入了卢梭、康德式的良心之声,海德格尔的存在之声,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

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说:“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由于言语来自心境,是意义的原创与聚集,与人的主体具有统一性,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关系,因此,在整个语言符号系统中是第一创造者。文字是言语的符号,是记录声音、心灵、观念和思想的载体,因而它是派生的,以在场的言语、言谈排除不在场的文字、文本,从而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对立,根源与派生的对立,进而导致言语、言谈、声音与文字、文本的对立。

逻各斯中心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西方的哲学,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语言学。西方人认为,只有拼音文字才是最接近神性和上帝的文字。因此,根据文字的拼音化程度,就可以决定民族、种族的优劣等级:“描画物体适合野蛮民族;使用符号表示字词句式适合于原始民族;使用字母适合于文明民族。”<sup>①</sup>这不仅通过语言的拼音化建立了以印欧语系为标志的欧洲中心主义,为印欧语系在其哲学的体系中找到了依托于“上帝”的理论根据,而且也排除了拼音文字之外的一切异质文字(如表意体系文字)的文明性、合理性。

以此为唯一的标准,西方人对其他民族或地区的语言评头品足,把世界上其他的异质语言都削足适履地强行塞入印欧语系的模式。英语的全球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在我们当代互为表里,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延伸,而汉字拼音化的构想也反映了这种趋势对中国的

<sup>①</sup> 卢梭著,洪涛译:《论语言的起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27页。

影响。所以,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指出:“形而上学的历史,尽管千差万别,不仅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甚至包括莱布尼兹),而且超出这些明显的界限,自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始终认定一般的真理源于逻各斯:真理的历史、真理的真理的历史(不同于我们将要加以解释的形而上学转向),一直是文字的堕落以及文字‘充分’言说之外的压抑。”<sup>①</sup>在中国,有些语言学家更进一步,将“压抑”发展成了“排除”,把语言定义为人类借以思维和互相交际的一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语音、词汇、语法被看做是语言的三大要素,完全没有了汉字的地位。

但是,笔者认为,汉字依托于中国文化,其根本精神是法天则地,是天人合一,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说到底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文化以守望和平、倡导中庸、追求礼乐、维护和谐为主旨,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具有不可取代的突出地位。汉字正是这种伟大文化的神经,或者说是集中的表现。唐代的虞世南说得好:“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因此,汉字不仅在间架结构、笔画走势中“书乾坤之阴阳”(东汉·蔡邕语),借用《礼记·乐记》的话来讲,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汉字间架结构的神韵中,“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因而“妙与道参”(唐·张旭语),夺天地之造化,而且一笔一画都凝聚了中华民族深层的历史记忆。“每一个方块汉字,扩展开来,就是一幅图画,就是一部生动而具体的历史。它往往是对中国古代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的状态,或者古人的一段闪光的思维的吸精抽髓式的摄取、描摹或记录。”<sup>②</sup>

在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言语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语言学界也提出了汉字拼音化的构想。五四运动以来的语言学家们这种长期、普遍的观点影响了国家的决策者。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提出了文字改革的方针:“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工作。”从此中国文字改革工作进入全面开展阶段。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汉字自身强大的生命力,这

① 德里达著,汪家堂译:《论文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② 张杰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页。

一目标并未实现。

与此相应,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界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全面吸收了国外的听说教学法,结构-功能教学法,功能教学法等等。听说教学法以重视口头语而轻视书面语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结构-功能教学法,也没有脱离语音中心主义。注重言语的习得、注重交际能力的提高,本来是没有错误的。它注重汉语运用的时效性,在我们目前交往频繁、人际关系复杂的当代,尤其具有很多的好处,特别是对于初步接触汉语的同学们来讲尤其重要。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教学理念到底延伸到什么时候?一直都只是注重“听”与“说”的交际水平培养,而没有中国文化的最终归宿,那实际上就是一种教学路径的误导,或者说,是手段掩盖了目的。因为这种教学方法忽视了汉字的价值,忽视了以象形、表意为特征的汉字所承载的文化。如果只重交际而偏废汉字的话,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以象形为基础、以表意为主导的汉字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传统、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华传统典籍由此变成无人问津的故纸堆。

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是,离开了汉字与中华典籍之后,汉语到底还成不成其为真正的汉语?曾经对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吕必松先生反思了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建设的过失,对中国目前的这种情况也是持批评意见的:

长期以来,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所采用的教学路子,基本上是印欧语系语言教学的路子。现在仍然占主流地位的对外汉语教学路子的特点是:不严格区分口语体语言和书面语体语言;按照“语文一体、语文同步”的模式组织教学内容和进行技能训练;把“词”和“句子”作为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把汉字排除在语言要素之外,使其成为词汇的附属品;追求教学方法的唯一性,或主张听说法,或主张功能法,或主张结构-功能法或功能-结构法,等等。这样的教学路子是否反映了汉字和汉语的特点,值得反思。有经验的汉语教师至少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没有向学生系统介绍口语体语言和书面语体语言的区别,致使学生语体转换和书面表达能力普遍滞后;我们也没有按照汉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汉字教学,这正是造成“汉字难学”的主要原因;更没有充分利用汉字和汉语某些易于理解和记忆的特点,

致使教学事倍功半。<sup>①</sup>

汉语,作为一种外语或者第二语言传授给外国人或外族人,在中国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活动就已经随着政治的彼此影响和文化的互相传播而开始了。由汉至清,有许多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也有更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和中国经典(从记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史称“三百千”)。虽然千百年来没有形成所谓“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但是,由于古代的中国文化对周边地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长期处于高的势位,年长日久,人们从来没有为对外汉语教学方法发愁,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照样兴旺发达。但是,随着近现代摧枯拉朽的现代化进程深入持久的开展,这个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家有目共睹,但都不愿意正视的黑洞。

1984年,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题词:“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各种有关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属性的讨论进一步展开。由于业内的专家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已经不是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出发,更不是从汉语本身的特点、基本属性出发,还由于教学的对象相当复杂,教学的目的也因人而异,由此而导致了教学内容的综合性、交叉性,教学手段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语言文化习得方式的复杂性,大家一叶障目,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瞎子摸象,隔靴搔痒,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时至今日,这门学科的理论建设远远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目标。

据笔者所知,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建设,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原因是:第一,由于长期浸润于欧风美雨的氛围之中,这些专家对汉字与汉语的密切关系、汉语的本质属性及其与中国文化的深层关系始终没有直接面对的正确视点。第二,由于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他们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实质以及这种话语霸权对汉语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危害很不清楚;始终坚持西方语言学中一些片面性的真理,“自乱其宗统”<sup>②</sup>,自掘坟墓,致

① 吕必松著:《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见李润新编:《世界少儿汉语教学与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② 曾经长时间在西方留学的陈寅恪先生就坚定地认为,以泰西文法来讲《马氏文通》,是“认贼作父”,是“自乱其宗统”,批评有些语言学家把印欧语系的特征“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陈寅恪著:《陈寅恪先生全集》下册,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第1374页。)

使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建设的前途相当渺茫。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汉字的拉丁化,就是消灭汉字的特征,进而最终否定中国文化的合理性和普世性。第三,始终没有站在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角度来把握对外汉语教学的属性和目的。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有些人完全听不得“文化”这两个字。实际上没有中国文化背景支持,汉语就显示不出它应有的魅力,因而也就不可能使汉语真正强势地走向世界。总之,当今对外汉语教学界只重视听和说,而不重视读和写的倾向应该立即纠正;只重视言语的交际功能而不重视文化传播的倾向应该立即纠正;只重视时效性的结构-功能,而忽视汉字与汉语深层的有机关系的倾向应该立即纠正。

## 二

历史文化语义学,是一门刚刚兴起的学科。在西方语言学的历史上,专家们是排挤语义学的。中国语言学界熟知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就坚持“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的观点,将语义学排除在语言之外。石安石先生说:“语义就是语言形式表达的内容。”<sup>①</sup>历史文化语义学,就是研究语义在历史文化演变中的发展。它当然要立足于词语、概念、范畴,但是,它最根本的依托点在陈寅恪先生“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思想,也就是汉字的语义功能与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现代汉语中的“词语”一词是从西方语言中引进的,用这一概念分析汉语语法,实际上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赵元任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印欧系语言中 word(词)这一级单位“在汉语中没有确切的对应物”,“在说英语的人谈到 word 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字’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 word 相同,甚至连近于相同也谈不上”。吕叔湘先生也说:“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其实啊,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词’不可。……汉语里的‘词’的问题还是得解决,可是只有把它当作主要是语汇问题来处理,而不专门在语法特征上打主意,这才有比较容易解决希望。”王力先生也说过:“汉语基本上是以字为单位

<sup>①</sup> 石安石著:《语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0页。

的,不是以词为单位的。”朱德熙先生也意识到:“研究汉语不关心汉字是不对的……我觉得过去研究语言的人恐怕对汉字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他还强调“尤其要研究汉字和汉语的关系”。

引述上面各位大家的论述,并不代表笔者是持字本位的学者。笔者引述各位专家的论述是想说明,汉字在汉语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研究汉语不仅要非常重视汉字在汉语中的作用,而且要把汉字放在汉语的中心位置。作为历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历史文化语义学不可能不研究词语、概念与范畴,但是,历史文化语义学最大的长处就在于凡事都要寻根刨底、追根求源、阐幽表微,它像文字的考古学一样,不放过词语、概念和范畴中的任何一个证据。历史文化语义学专家冯天瑜先生曾经对笔者讲:“语言是一扇窗户,打开以后我们看到的都是文化。”这对我们在这个具有五千年文化传承历史的文明国度,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来讲,无论如何都是具有重大的启发作用的。

法国汉语教学专家白乐桑先生认为:“无论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方面,在教材的编写原则方面甚至在课程设置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白乐桑先生说得很清楚,第一,对外汉语教学正面临危机;第二,必须正视汉字的特殊性;第三,必须正视汉字与汉语的特殊关系。那么怎么解决或度过这个危机呢?白乐桑先生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解决危机的必由之路就是一定要解决汉字问题。可是,汉字并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载体,它本身就是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就是汉民族文化发生、演变和发展的化石。汉字的本质属性是人文性。解决汉字与汉语的关系问题,汉字、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宝库。

比方说,学生学习了“社会”这个词,老师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学生,“社会”,就是在共同的物质条件基础上互相联合起来的人群。如果学生水平很高,相应的解释可能会更加深一些:社会就是指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如果学生来自西方,汉语水平又很低,以至于上面两种解释他都听不懂,老师怎么办?最简便的办法,在这个时候就是用学生的母语直译。例如,用英语直译为 society,可是, society 为什么就可以直译为“社会”而不是别的汉字构成的这一词语呢?对于学生来

讲也许当下他没有能力,也不需要彻底弄清楚这个词语的来源和语义的变化过程,可是对我们的每一位老师来说,却是不能不作进一步了解的。冯天瑜先生的《新语探源》对这个词语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冯先生指出,“社”、“会”这两个字,都与现代语汇中的“社会”这个词有关。“社”,从示从土,指居住在一起的人群共同祭祀土地神的处所。《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会”从人从曾(曾,益也),合也。指人群的聚集于会合。《尚书·洪范》:“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孔颖达疏曰:“集会其有中之道而行之。”“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最早出现于《世说新语补·德行上》:“王叔治七岁丧母,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修社会,叔治感念亡母,哀甚初丧,邻里为之罢社。”这里的“社会”只是祭祀土地神的聚会。发展到宋代,中国传统语汇中的“社会”一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例如程颐的《近思录·治法》就有:“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不过,虽然这里的“社会”还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society)的含义,但是这个词语的意义已经从祭神的聚会推演为民间结社,并包含基层社区的内蕴。最早用这两个字对译西方的society的文献,是始于日本江户时代学者青地林宗的译作《舆地志略》(1826年出版)。Society一词是由拉丁语socius和希腊语结合而成的。Socius是形容词,其名词是societas,有伙伴、共同、联合、同盟之义,经法语演变为society,成为16世纪以来被广泛使用的市民社会概念母体,狭义指人与人之间持续的相互行动的积累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广义指由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创造出来的事物的总和,与人的外在物“自然”相对应。在日本明治间的新闻记者、作家福地源一郎笔下,“社会”一词已经从古代语汇之具象意义的“社会”转变成为现代的有着抽象意义的“社会”了。<sup>①</sup>

作为对外汉语教师,在给学生解释“社会”一词的时候,既不能简单地说这个词语在古代汉语中早就已经有了,也不能完全说这个词就是外来词。对具有这方面求知要求的同学,我们是一一定要将这个词语的来龙去脉讲清楚的。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老师是不需要讲这么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完全没有这种知识储备或思想意识的老

<sup>①</sup> 冯天瑜著:《新语探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60—562页。